

目 录

思思工学社与武冈第一代共产党人·····	刘寿祺	(1)
我在邵阳·····	徐君虎	(56)
我的治学道路·····	马非百	(81)
民先队在邵阳的活动·····	李春芳	(92)
抗日战争时期邵阳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国团体 ·····	禹问樵	(98)
邵阳李洞天·····	陈新宪	(105)
梁湘芸烈士事略·····	石季佳	(109)
邵阳青年抗战服务团与雷一宁·····	雷震寰	(113)
旧时代的宝庆特商·····	邵阳市 ^民 工商 ^建 文史小组	(117)
邵阳特产——玉兰片·····	魏元清	(127)
宝庆的毛笔行业·····	李滢生	(134)
邵阳市第六中学校史·····	李仲平	(140)
陈光中罪恶的一生·····	陈新宪	(150)
订正·····	本刊编辑室	(166)
编后记·····	本刊编辑室	(167)

思思工学社与武冈第一代共产党人

刘寿祺

(一) 云山星火——思思工学社

“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前后，风华正茂的湖南青年思想极为活跃，其中特别是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他们不满现状，担心民族前途，都在探索如何改造中国，转弱为强。适于此时，西方的改良主义哲学理论也相继东来。英国哲学家罗素于1921年来中国讲学，宣扬基尔特主义，说穷弱的中国只须开发实业，兴办教育，即可改变经济贫困和科学文化落后的现状，而决不要去搞涉及政权问题的流血斗争。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也于1919——1921年来中国宣讲实用主义，并到第一师范讲学一个多月。苏联的社会主义，欧美的改良主义，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主义，一时齐在中国的天空上雨拂云翔，于是在青年学生的思想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从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信仰。有马克思主义者，有三民主义者，有国家主义者，有基尔特主义者，有工团主义者，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各执一观，莫衷一是。而“五四”运动、“六三”运动的伟大革命实践迅速地提高了人们的认识，崇信马克思主义的越来越多，志趣相投的便自发地组织起来，研究问题，探索真理，安排计划，决定行动。

思思学社就正是这样一个自发的组织。她于1919年在一师成立，先称武冈学友会，欧阳东、邓宗禹是主要组织者。旋即命名为“思思”，意在以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为指南，聚集向往社会主义的志同道合者在一起，走革命的路，搞社会主义。

思思学社虽然也主张从发展生产和兴办教育入手，但与基尔特主义是迥然不同的。思思办工厂、办教育，旨在为革命开创一个立足的场地。欧阳东毕业后在一师附小教课。1919年夏，他离开长沙到宝庆循程小学任教。1921年冬，邓宗禹从一师毕业回到武冈。这时的武冈，前清遗老虽已退居幕后，但一批遗少，又在拥护共和的旗帜下，很快地成为了垄断乡曲的新劣绅、新政客。他们把持学界，操纵县政。以林兆鹏、朱杰恭、刘世球、黄立中、蒋清甫为首的武中派，与以肖雨亭、朱宇鉴、舒功为首的优师派，形成既沆瀣一气，又互相倾轧的两大地方帮子。第一师范毕业的学生回到家乡，简直无法插足。

邓宗禹不向这些地方帮子俯首躬腰，决心开创学社场地。他发动学社成员，多方筹措经费，在云山峰下、资水源头的武冈城内，租用水府宫几间房屋，购置几台织布木机，加上纺纱、织袜工具，于1922年春办起了“思思工厂”，并自任工厂经理。不久，又将厂名更为“思思工学社”。同年，邓将工厂成员的子弟及亲友子弟招集起来，在老南门城楼上办起一个复式小学班，他自己又兼教员。还附有一个只有十几个学生的小学课程复习班。办学一期，成绩显著，增设了高小，但校舍无着。附近的文庙，年久失修，遍地荆榛，灰粪堆积。当时典狱署长刘世煌为邓宗禹“筚路褴褛，以启山

林”的艰苦办学精神所感动，便派犯人每天去文庙斩棘除荆，运走灰粪，修补颓垣破壁，断瓦残檐，把里面弄得干干净净，让思思搬进去办学，并赠送了一批桌、凳、椅、柜。从此以文庙为校舍，正式命名为“思思学校”。

思思学校成立后，欧阳东辞去新宁县小学校长职回武冈任这所私立小学的校长。欧阳与邓是志同道合亲密到愿意死在同时、埋在一处的革命战友。邓管工厂，欧阳管学校，合作得很好。工厂设有织布、织袜、缝纫、染布四科和一个营业部。各科聘请技师，增招工人，增添机器，同时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由于经营得法，发展很快。水府宫房屋不够，又迁至关圣庙。产品销售本县城乡及邻县口岸。“思思”的学生人人都穿工厂织的黑白间纱米花布学生制服，领上绣红丝线“思思”二字。因此人们议论说：武冈快要“思思”化了。

学校由于有欧阳校长与全体师生的艰苦奋斗也蒸蒸日上。教员多是学社的社员，一师毕业后就从长沙回“思思”任教的，如夏大纶、夏昌言、肖海涵、袁跃龙、米楚楠等都是。有的则在外县外校工作一段又转回“思思”，如邓树荣、邓星罅、刘泽、唐盛等都是。（唐盛是1924年下期辞去湘西十县联合师范的教务主任到“思思”任教的。）有的如邓成云、米楚贤等是一师还没有毕业就因需要而来的。有的如李秋涛、王圭田等则因志趣相投，目标一致，而欣然就任的。当年先后在“思思”任教的56人中，第一师范学生占16人。校长欧阳东多才多艺，教音乐能自写歌词自谱乐曲，吹、拉、弹、唱样样是能手。邓宗禹来校兼教历史。教导主任先是夏大纶，后是唐盛，都教语文。全校从校长起没有一个不

教课的。

“思思”所开的课目很多，有国文、算术、自然、历史、地理、英语、卫生、生物、社会、公民、体育、音乐、美术、工艺、劳动等。每个教员对自己所授科目都很认真。

“思思”的特点就是培养学生多能。音乐、美术、工艺都当正课上。体育就不单是训练几个球员，也要求全能。学生如果只有国文、算术、英语成绩好，其他不行，也算不得高材生。因此学生也就往“全能”发展。1923年春的一次运动会，全县的锦标被“思思”夺得了三分之二，崭露头角，震动了全县。学生的手工艺品，选优陈列，绘画水平已相当高。“思思”虽只是一个完全小学，但很注意课外各种科学活动，在课堂上学的，许多都经过课外活动来实践。

学生中成绩较差的，教师在课外加以辅导，使其逐渐赶上来。学校的升降级制度是严格的，一学期有两次月考，月考也实行升降，成绩优异，前三名升上一班，最差的降下一班。因此，差的努力赶，好的更前进。全校学生成绩比起同等学校来要高出一个水平。有一个只读完六年一期的班，校长要他们去考县中，结果取录很多，校长拿名册去县中要他们不要取录，但县中不让，还是在这个班取了十四名。有一个初小毕业班国文考试，县长事先通知，到时候他亲到考场出题，并要求写浅近的文言文。考毕，县长带走试卷，亲自组织外校教师评卷，结果成绩优异。县长信服了，发给学生许多奖品。

至于教师任课则着重一个“专”字。音乐、美术、劳作工艺、体育等分低、中、高年级，每科都有三个教师，所任科目不随便变动。因此，教师能专心致志研究所教学科的内

容和教学方法。学校抓教师的业务提高也是很注意的，经常组织教学研究、经验交流、教学观摩和教学评议等活动。教师对学生的家庭访问也很经常，而这些是当时其他学校所不曾有或很少有的。

“思思”一开始，就很注意学校的政治方向，也很注意培养民主作风，主张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准搞特殊。教师刘德隆不大看报，不问政治，校长和其他同事就帮助他，使他完全改变了态度。学校纪律，师生都要遵守，要求学生做的，教师必须先做到。因此“思思”教师不随便请假、缺课，迟到、早退也很少。教师袁跃龙见班内一个学生用瓦片误伤同学而不敢出来承认，就在班上先行自责，说是由于自己没有能力把学生教育诚实，才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一来，感动了那个学生，马上出来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校长认为在学校里，应当容许学生对教师提意见，有缺点要让别人提，学生不能单是怕老师，他们提意见是希望老师更好。老师不要气量窄，应当看成是学生进步的表现。学校设有意见箱，让学生随时提意见。有一天午休时，一位教师赤膊在门口乘凉，见一学生在墙上行走，就喊“哪个爬墙？”学生回答“谁打赤膊？”这位教师立即省察自己也有欠缺，不怪学生调皮，马上说：“好！我把衣穿上，你也下来。”就是这些作风，学校师生关系很好，教师爱护学生，学生尊重老师。

“思思”的制度也是较严的，如值日制，请假制，学生升降制，考勤制等都严格执行。学生纪律之好是全县少有的。在课堂，听是听、记是记、读是读、写是写，没有人扰乱秩序。在操场上集合整队，有如军队的迅速整齐；而活动

起来，却又如生龙活虎。外人一进入“思思”，就觉得这个环境是个能给青少年很好的教育的地方。“思思”的纪律、校风是过得硬的，什么时候都是一个样，不是装样子给参观、视察的人看；不是象某些学校那样，有人看，俨然肃然，人家一走，覆地翻天。

与此同时，学校也很注意卫生保健。二四年冬，武冈全城发瘟疫，每天都抬出死人，最严重时一天抬出四十多具。

“思思”采取了多种卫生防疫措施：室内室外，用具、空间，都消毒，喷药、熏药；又置滤水缸，饮水过滤；学生各自备手巾，学校供花露水，用湿手巾捂鼻以代口罩，因此全校师生无一感染者。

“思思”设备的齐全，在当时也是少见的。除购长沙商务印书馆一套教学仪器，价值银洋800元；买来风琴、价值80元。体育，不单是有排球场，还有跳高、跳远设备。铁饼、铅球、标枪、单双杠、木马、跷板、轩辘梯、秋千、滑梯、哑铃、木刀、齐眉棒等，应有尽有。文字课的挂图、地图，一套一套完整齐全。自然、生物、卫生等课均可做实验。至于报纸、杂志、图书，数量也是比较多的。当时县政府也只是一份《湖南报》，而“思思”则多一份《大公报》，别的学校杂志一本也没有，而“思思”有好几套。学生读物都订了不少。

“思思”为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尽力扩充各种设备，因而负债不少。每逢比期，债主临门，全由校长欧阳东去应付。他待人有礼貌，谈吐从容，又善于辞令，总是能把困难克服得很好，而全不伤和气。欠的债，内有工薪、外有书纸文具费，而木器行的贷款以申木匠家为数最多。这些巨额

债务，除由邓宗禹、欧阳东、彭关民、龙升如、刘善群等变卖田产还清一些外，还有相当大的负数。“思思”工厂对学校每年也只能支援800千文。欠债成为“思思”学校唯一的大包袱。但学校没有因欠债而停止脚步。每月一次的成绩展览照常举行，春秋都有远足郊游和旅行活动。教员领队，低年级郊游，中年级参观外校，高年级到野外采集标本，或作社会调查，常是为时半月。读书能联系实际，学生的知识而日益广阔。平常朝会、晚会，既有回顾，也有展望。校园的清晨，书声琅琅；自习灯下，寄宿生潜心复习。每学期一次恳亲会，展出成绩，表演节目，让家长了解自己子女的学习情况和学校生活的活泼多样。因此，家长跟学校关系很好，对学校很满意，也很关心。

“思思”校誉越来越高，远近称道，声达省城。因此人们争送子弟，百里外就读者不少。1925年，“思思”已是一所近千名学生的学校了。

1926年省教育厅派督学魏振翊来校视察，他首先潜行入校，观察学生的学习和风纪，然后又从各方面深入考查，感到这个学校的校风和成绩实在可取，因而大为嘉勉。他了解到学校经费困难，主动建议学校具报申请。不久，省教育厅批予乙等津贴每年600元。从1925年冬追发，27年初学校领到1200元，才偿还了部分债款。

“思思”之所以能够办出这样的成绩来，教职员工多是工学社社员，思想一致，团结紧密，步调整齐，一心为国家培养人才，振兴民族，是其主要原因；但领导人物的精神、作风和才能为大家所敬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邓宗禹、欧阳东为创建厂、校，不仅在工作上呕心沥血，而其舍

已为公的精神更堪敬仰，邓变卖田产，欧阳东变卖妻子的金银首饰并哄出其父买铺面的两仟银元的价款，一概投入工学社作为厂、校开支。

欧阳东原在新宁县立小学当校长时，每月工资32元，唐盛在湘西十县联合师范当教导主任，每月工资60元，他们在“思思”都与所有社员教师一样，每月只有1200文（非社员教师每月8000文）。又正是由于领导有这种艰苦与共的优良品德，所以教师们认为在“思思”教课，虽然工资低，但政治空气好，大家都觉得干起事来精神愉快，谁也不愿意离开她。

当然，“思思”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她是与反动派别对立而存在，并同他们作斗争而前进的。邓宗禹是个实干家，善于经营筹划。欧阳东足智多谋，大有“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的气概。他们有思思工学社这个基地，又拥有一批德才兼备的能人，这对那些反动派别来说无疑是股压力。因之招来嫉恨和破坏，势所必然。如“思思”刚搬进文庙建校，劝学所所长肖雨亭即怂恿联合小学校长周庆材、教员蒋孝荣（清甫）横蛮无理地争夺崇圣殿，旨在堵住“思思”后垣，不让发展。同时截断通向公共体育场的过道。直到二四年，“思思”取得社会支持上书辩驳，驳倒了联合小学，才不再向该校交租。

当时的武冈县议会，是劣绅学痞的大本营。他们作出决议，将皇城坪投标拍卖，这样便把“思思”学生去宿舍的路拦腰截断，附近各校的活动场地也随之没有了。“思思”学生即联系各校学生，约定一夜间把女墙、界碑和规划中的路基拆毁得一干二净，重新树立起公共体育场的大木牌。县议

会迫于学生的公愤，不得不把价款退还买主。尽管反动派别由于威风扫地，而对“思思”更加嫉恨，却也无可奈何。

欧阳东一向善于做社会工作，县长周吾从很器重他。他跟驻军团长刘克家关系也很好。“思思”没有寄宿舍，刘团长就主动让出节孝祠，将驻在里面的部队调往高沙。蔡巨猷的部队为赵恒惕所败，逃至武冈，欧阳东在败军未抵城关镇时，即持名片往见驻军首领，取得“学校不许驻军”的牌示，保证了上课的照常进行，县长也常来校看看，刘团长更是常来常往，与“思思”的教职员成了朋友。就这样，“思思”又成为了武冈政局的中心。因此，又更招致了对立派别的嫉恨，可是依然无可奈何。

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一个小农场，组成整个思思工学社。这个集体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的联合；农民运动开始后，她又是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的大联合。工学社的领导成员欧阳东、邓宗禹、夏大纶等，原在第一师范均是S·Y，于是S·Y便成为工学社的核心。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宣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重新加以解释，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改组中国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领导。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参加并领导国民革命。在这样一个即将向军阀和帝国主义展开进军，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好形势下，思思工学社社员会议讨论了思思工学社的政治方向问题，并经过深入分析和热烈辩论，一致认为要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当时，即为拥护大革命的道路。

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思思”要扩大规模增办中学。可是当时的社员和教职员中没有大学毕业生，有一个所谓学历、资格不够的问题，于是决定公推夏大纶去长沙深造，教导主任由唐盛接替。这是一次关键性会议。这年夏天，夏石泉（即夏大纶）考取了长沙私立晨光大学，由工学社出钱送读。思思工学社在统一思想确定了政治路线之后，在武冈的政治活动中就迅速地显露出了她的革命作用。到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她就以前锋的姿态完全成为武冈的革命的中坚了。

（二）大革命风云在武冈

大革命时期，武冈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革命斗争，是一九二六年开始的。这一斗争的蓬勃开展与思思工学社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思思”的创始人和中坚力量，原是S·Y，或C·P，他们在办学和从事厂、校结合的同时，密切注意了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时事教育包含政治教育，是学校 and 工厂的“职工夜学班”的必修科目。邓宗禹、欧阳东、夏大纶、唐盛、夏昌言等都是亲任时事教育课的教员。特别是欧阳东经常在学校礼堂或银杏树下集合师生开会，分析时局，阐明方向，对师生们的鼓动作用很大。一九二三年，继“二·七”惨案之后，中国人民掀起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的爱国反日运动。四月五日湖南工团联合会等发起组织“湖南外交后援会”，开展对日经济绝交运动，遭到日本军阀的袭击，造成“六一”惨案。省城学生、工人举行反日大示威游行，罢工罢课以示抗议。与此同时，由于赵恒惕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激起了三湘人民的愤怒，掀起了全省的大

斗争。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黄埔军校的创立，都成了“思思”宣传鼓动民众和对师生进行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武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学生、工人成群走出学校、工厂、作坊在全城街头、广场广泛宣传，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大有预示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之势。

与此同时，邓宗禹和中共湖南省委青运委员夏曦联系，开始以地下方式训练同志，发展C·y。夏大纶在“晨光”一方面求学，另一方面去长沙参加党组织，以便回县发展C·P。

“思思”出现在武冈，主要是革命时代的产物，但同第一师范渊源深远。她办学的方法和风格都来自一师，特别是在革命教育方面是与一师一脉相承的。下面将“思思”和一师的关系以“思思”教师的来源加以印证。

姓名	班 别	何时毕业	在“思思”任何职
欧阳东	6 班	1918年夏	校 长
肖镇湘	8 班	1918年夏	教 员
邓树荣	11班	1919年夏	教 员
邓星鐔	11班	1919年夏	教 员
邓宗禹	15班	1921年冬	厂长兼教员
刘德隆	15班	1921年冬	教 员
刘 泽	15班	1921年冬	教 员
夏吕言	16班	1922年夏	教导主任
肖海涵	16班	1922年夏	教 员
唐 盛	17班	1922年夏	教导主任
夏大纶	17班	1922年夏	教导主任
袁跃龙	17班	1922年夏	教 员

米楚楠	18班	1924年夏	教员
李英	18班	1924年夏	教员
袁也烈	21班	1926年夏	未毕业入 黄埔,武冈特区委员,与欧、邓关系密切
邓成云	24班	1927年夏	教员
米楚贤	27班	1929年夏	教员

毛泽东同志是八班,夏曦同志是十六班,欧阳东毕业后留校在附小任教员一年,其时适为毛泽东同志任附小主事(即校长)。欧阳东、邓宗禹曾积极参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驱张(敬尧)运动。邓宗禹、夏大纶与夏曦同住一室,是志趣相投的挚友,共同战斗的同志。夏大纶离开晨光后,在省党校当夏曦的秘书。这些同学关系,后来都成为革命的同志关系。

此外从“思思”到长沙的湖南革命司令部,还有一条渠道,这就是文化书社的上下联系。邓宗禹、夏昌言、夏大纶都是武冈分社的创办人。虽未在书社工作,但具体负责书社工作的商务印书馆武冈分店的经理李秋涛,与他们情同手足,肝胆相照,他很快也成了工学社的骨干。

这年暑假,邓成云回武冈,停留二十多天,对工学社作了实际了解和襄助,也增进武冈与长沙的革命联系,邓早已是C·Y。正因为工学社有上述渊源,她在革命运动中的表现便越来越积极、主动,革命工作的进展也很快。

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四大”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把组织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保卫农民利益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这年春,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省党部选举成立,革命形势日益发展。武冈的土豪劣绅惶惶不

安，而那些政、军、学界，即武冈的反动派别的头面人物，观望依违，企图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装装门面，做做姿态，敷衍下去，而真正扛起革命大旗的则是思思学校、思思工学社。他们站在运动的最前列，高喊“打倒列强、洗雪国耻”，“打倒列强除军阀”等口号，运用各种宣传形式，唤起民众，传播反帝爱国思想，成为组织革命的一支主要力量。长沙有什么行动，武冈就有什么行动。

一九二五年夏，“思思”起了一个质的变化，李秋涛加入了C·P，接着便是欧阳东、邓宗禹都以CY转入了党组织。这时党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特约秘密通信员都有了，这是武冈第一个中共特支。这年秋天，国民党省党部指示成立武冈县党部筹备委员会，李秋涛、欧阳东以共方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刘世球、蒋孝荣等负责筹组。工学社的C·Y成员，为了能去县党部内开展工作，都先后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一九二六年一月，邓成云从长沙回县，与“思思”详细研究武冈情况，三月返长，他带去了“思思”教职员的简历表和武冈的情况报告。

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大革命进入高潮，反英、讨吴（佩孚）、驱赵的口号响彻全省，赵恒惕于三月十二日在强大的革命压力面前，不得不逃离长沙。此时，农民运动在湘东、湘中、湘南迅速发展，各地都在为迎接北伐军入湘作准备。这时的工学社，除了为革命运动大作宣传外，又力促领导全县革命运动的合法机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早日产生，好在全县开展农运和工运。中共武冈特支一方面发展党、团员，教师中唐盛、夏明溪、夏时、王圭田等均于这时入党，

在学生中也发展了团员。另一方面加强职工夜学，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提高工农的觉悟。

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成立：这时，革命已成为时尚，反动派别方面，也正在想方设法披上伪装，原参议会中的那些人，就企图把学界中的一批少壮拉入自己的卵翼，以抵消革命派的实力，并想在即将成立的县党部内争得席位，攫取权力，使革命变为能最终维护他们利益的应景故事。而工学社，虽然领导骨干一般加入了国民党，但它又是独立自主的革命左派力量，是共产党在武冈的一个革命集团。这一点不只是革命民众，就连她的对立派别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当时社会上常把新派称为“思思”派即革命派。

一九二六年六月下旬，北伐军先头部队进入湖南，七月五日攻下衡阳，不数日连克湘乡、醴陵、湘潭，十二日夺取长沙，继而下宁乡、益阳，所向披靡，革命进入高潮，形势空前大好。邓成云在第一师范参加了迎接北伐军的宣传、慰劳等工作，曾至醴陵、衡阳等地，旋又奉省党部委派，随军回到武冈，宣传北伐，并促成国共合作的武冈县党部迅速成立。酝酿成立的会议是在五显庙开的。国民党以刘世球、蒋孝荣为代表，共产党以欧阳东、李秋涛为代表，讨论筹备事宜。本来“思思”成员同这些反对派别的头面人物在革命目标上就是无法统一的，所以争论了将近三个星期，才选出县党部的领导成员如下：

执 行 委 员

刘世球 常务委员（相当于书记，县立中学教员，国民党人。）

刘云龙 组织委员（“思思”教员，共产党人。）

邓成云 宣传委员（“思思”教员，共产党人。）
夏佩文 农工委员（“思思”教员。共产党人。）
黄立中 青年委员（国民党人）
李秋涛 财务委员（“思思”教员，共产党人。）
蒋孝荣 文 书（国民党人）

候 补 委 员

欧阳东 （“思思”校长，共产党人）
夏克绍 （原“思思”补习班学生，共产党人。）
张爱凡 （国民党人）

监 察 执 委

邓宗禹 （思思工厂经理，共产党人。）
姚贤梓 （“思思”教员，共产党人。）
唐楚皋 （国民党人）

候 补 监 委

周 洋 （国民党人）

从上列县党部执监和候补执监委中，可以看出在当时领导全县革命运动的合法机构中，中共力量处于优势，这对开展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群众革命斗争是个有力的保证。

县党部成立后，决定《武冈民报》增副刊《武冈钟》，宣传新“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由邓成云任主编，王功铎兼副主编，邓宗禹、李秋涛、林楚贤任编委（五人都是中共党员）。宣传完全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国共合作的县党部成立后的斗争：县党部本来就是在激烈斗争中成立的，因此成立以后，斗争依然曲折、复杂，风波不息。刘世球、蒋孝荣、黄立中、唐楚皋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右派，搞两党合作、搞农运、工运，他们都是迫于大

势，混迹潮流；因而在运动的每个环节、每个方面，不是敷衍，便是捣乱。

一九二六年八月上旬，省农协派农运特派员张五美来到武冈，住在县党部内。张是旧邵阳县今隆回人，第一师范学生，二五年加入C·Y，由组织派往广州农运讲习所，后改政治讲习班，二六年回湘搞群运。省党部派张来县后，在党内兼任农运委员。张首先了解思思工学社，发现工学社在武冈打下了一个很好的革命基础，于是与欧阳东、邓宗禹、邓成云、唐盛、李秋涛等经常一起商决大事。

八月九日，县党部农委会发出通知，催促成立农民协会。十日在县党部召开筹备会议，九月十日在联合小学成立了县农协筹备处，刘卓任主任。不久，又在筹备处的基础上成立了武冈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刘卓，副委员长曾维汉。执行委员有：秘书长邓成云，秘书刘世寿、舒焕南，组织部长邓宗禹、刘文杰，组织干事易官午，建设部长夏时，财务部长刘步云，宣传部长欧荣贵，执行委员李秋涛、段仁安、刘功卿、贺行琰、周寅安、邓智英（女）等二十余人（陆续补足，不是一次选出）。

县农协成立后，张五美随即与思思工学社的夏大纶、夏克绍一道去天心桥一带发动农民，在维道团学校成立乡农民协会，推段仁安、夏柏传、王子鲁、钟菊生、王少卿为执行委员，段仁安为委员长。接着在蔡家塘发展农协会员，成立区农民协会，以段仁安、姚贤梓、王子鲁、钟菊生、王少卿为执行委员。会员增约百余人。此时，邓宗禹也去农村培养农民积极分子，通过积极分子串联发动，南乡十三团二六年冬至二七年春共成立区乡农民协会十八个，会员也大大发展